



第一編

百年中國的政治激流

一、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

在我們所要論述的1840–1949年這個時間段落中，古老的中國經歷了其開天闢地以來最為驚心動魄的衝撞和變遷。現代化的變遷與受挫構成了整個歷史的中心圖景。希望與失落、亢奮與冷漠、突變與回歸……交織成一幅幅交替顯現的戲劇性場面。千年循環的歷史終於擺脫了「治」、「亂」相替的怪圈纏繞，走向了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

現代化變遷，是這一個世紀歷史演化的主軸，也是錯綜複雜現象表層下面蘊含着的歷史底蘊。不過，當我們回過頭來檢視這段歷史，都會承認現代化的目標並沒有在近代中國實現，比起中國幾乎同時起步的鄰國日本，差距是極其明顯的。為什麼中國現代化是這樣的步履艱難，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遷、是什麼因素阻礙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主題

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Cyril E. Black）指出：在人類歷史中，有三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第一次革命性轉變發生在一百萬年以前，原始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以後出現了人類；第二次革命性轉變是人類從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而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則是近幾個世紀正在經歷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

區、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¹

我們將人類歷史上這第三次大轉變理解為現代化。現代化在這裏是一個活生生的動態性觀念，它與現代性有所不同。現代性所指的是這個概念所象徵的工業文明結構中蘊含的各種靜態性要素，而現代化則意味着一種歷史的連續或時間的過程，是一個當代世界仍然在持續着的歷史變遷。

從全球範圍來看，人類的第一、二次大轉變是在各個地域或各個民族相互隔絕、彼此孤立的狀態下個別實現的，而第三次大轉變的情形恰恰相反。由於知識爆炸、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所提供的客觀要素，使現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它在地球的某一區域首先突破，隨後伴隨着血與火強行擴張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部落。歷史也確實如此。現代化最早是從西歐開始突破，隨後向歐洲腹地及北美擴展，最後又通過殖民法擴散到南美、澳洲、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由於具有這樣的歷史背景，現代化又被稱為工業化、歐化或西化。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概念是等值的。但現代化較之西化、歐化或工業化這些概念有着更豐富、更深刻的內涵。首先，現代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必然蘊含着每個國家或民族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這就使現代化的道路呈現出某種開放和多元的性格。其次，現代化也不僅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進步，它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的全方位轉型。

1. 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4頁。

關於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階段，國外學者有不少理論假說，比較著名的有羅斯托（Walt W. Rostow）提出的經濟成長五階段論和布萊克的現代化發展四階段說。相比較而言，布萊克的假定更具有普遍性。他認為，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必定面臨以下幾個階段：第一，現代性的挑戰——現代觀念和制度，現代化擁護者的出現，這一切使社會在傳統知識範圍內遇到最初的對抗。第二，現代化領導的穩固——權力從傳統領袖向現代領袖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尖銳的革命鬥爭通常可達數代人之久。第三，經濟和社會的轉型——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達到這一程度：社會從農村和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轉向城市和工業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會整合——經濟和社會轉型導致整個社會基本結構的轉型。²

更概括地說，我們可以將布萊克假說的四個階段分為前後相續的兩大歷史段落：第一階段，在回應現代性挑戰的背景下重建政治共同體；第二階段，實現以經濟起飛為動力的文明結構轉型。那麼，1840–1949年的中國現代化處於什麼樣的階段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個世紀之中，中國所面臨的形勢是：外部世界的挑戰出現了，西方列強以其軍事的壓力、經濟的強大和文明的優勢逼迫中國開放門戶，加入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另一方面，在中國社會母體內部，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個層面，現代性因素也逐漸萌芽出現了：現代的機器製造業、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思潮、人際契約關係、新的社會利益集團（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現代知識階層、城市市民階層、現代職業軍人集

2. 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60頁。

團；現代官僚集團）等。然而，這些現代性的要素只是限於社會發展的某個局部、某個層面，在整體上並未實現相互之間的整合，整個社會在新舊各種因素衝突下顯得零散、分裂、無序。更重要的是，作為經濟起飛必要前提的一個穩定的、現代的政治共同體遲遲未能在制度上得以落實、奠定，中央政權頻頻更替，從清王朝到北洋政府，再到國民黨政府，最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平均25年就發生一次政治革命。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1949年之前，中國現代化始終停留在第一階段。實現從傳統領袖向現代領袖的權力轉移，重新配置社會資源，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放的、穩定的、高效率的政治共同體，為未來的經濟起飛和文明結構全面轉型創造前提，這是1840–1949年整個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歷史主題，也是我們研究這段歷史時所依據的基本出發點。

中國現代化的啟動類型

由於人類第三次革命性轉變所特有的彌散、擴張性質，不同國家現代化的起步時間以及啟動方式各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列維（Marion J. Levy Jr.）將其分為「內源發展者」和「後來者」兩大類型，也就是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早發內生型」與「後發外生型」。前者以英國、法國、美國等國為典型個案，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早在十六、十七世紀就開始起步，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因素都來自本社會內部，是本民族歷史演化的自然結果。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包括德國、俄國、日本以及廣大的後發展國家，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大多遲至十九世紀才開始起步，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化的示範效應。顯然，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屬於這一類型。

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進入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過程的。在這之前，中國歷史呈現出長達兩千多年的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治」、「亂」循環。金觀濤、劉青峰在他們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是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宗法一體化結構，它具有兩重調節機制。第一套調節機制在王朝穩定時期起作用，它用強控制保持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互相適應。第二套調節機制是在大動亂時期發生作用，宗法一體化結構為王朝修復提供了範本，大動亂一方面消滅了無組織力量使王朝修復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摧殘了新生的社會萌芽。正是後一重調節機制使傳統中國成為千年循環的「超穩定系統」。³ 儘管這一頗具影響的理論假說在國內學術界爭論很多，但中國社會兩千年來「治」、「亂」循環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沒有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斷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中國仍將繼續循環下去。

也出於對中國歷史的同樣認識，美國已故的著名中國學專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提出了「衝擊—反應」模式，認為到十九世紀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後，「在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一系列複雜的歷史進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和文化的進程——對古老的程序進行挑戰，展開進攻，削弱它的基礎，乃至把它制服。中國國內的這些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⁴

3.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象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62頁。

4.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

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曾經長期主宰了國際中國學界，對國內學術界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根據這一分析模式撰寫的大量研究性成果充分顯示了中國現代化所呈現的後發外生型性質，然而，中國現代化是否是一個簡單的對西方衝擊的回應過程？在其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社會內部的本土因素是否也起了某種主動的、創造性作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中國學界對費氏的「衝擊—反應」模式個中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作了深刻的反省。他們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是從西方衝擊的角度，而是從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來重新審視1840年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美國第二代中國學專家柯文（Paul A. Cohen）將這種新的研究趨向概括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這一觀照中國現代化的全新視野近年來也在國內學術界越來越受到重視。

實際上，「中國中心觀」的崛起並未全盤否定「衝擊—反應」模式的合理性，只是為觀照中國現代化提供了更全面的思路。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現代化進程，對於中國來說既是古老的歷史在新世紀的驟然斷裂，又是在以往的傳統中靜悄悄的綿延。事實上，早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二百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對中國的滲透和影響就通過利瑪竇、湯若望等人開始了，而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帝國內部的一系列社會動向也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歷史和心理的前提，即使在1840年之後，作為歷史象徵的許多社會文化現象，如人口過剩危機、土地兼併嚴重、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地方武裝割據、攘外與安內之爭、文化上的激烈反傳統、綱常名教的式微等，在中國漫長的文明史上絕非罕見，從形式和內容來看都只是歷次皇朝更迭或權力轉移過程中必然伴隨的症候而已。我們應該看到，在1840—1949年這一個世紀之中，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傳統危機。如果在過去，歷史勢必依照延續了兩千

年的自身邏輯消解和克服這些危機，進入又一輪的王朝循環。只是到了十九、二十世紀，當西方的示範展示了另一種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時，中國才對自身歷史的內部挑戰產生了一種多少是變化了的回應方式。這樣，中國歷史的內部因素與西方文明的示範效應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着中國現代化的反應類型與歷史走向。

柯文正確地指出，將中國問題作分層處理，也許是最恰當的。在外層帶（就地域或文化而言），諸如通商口岸、現代工商業、大眾傳媒、基督教等的出現，確實是西方衝擊的直接產物。在中層帶，像太平天國革命、同治中興、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聯省自治、工農武裝割據等，都不是西方衝擊的直接產物，而是經西方催化或賦予某種形式與方向的古老而又全新的歷史現象。在內層帶，如中國的人口、土地資源、內地和鄉村的宗法關係、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底層的騷亂、匪患等，一個世紀以來基本沒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感染，保持着自己亙古未變的外部標誌與內在象徵。對不同區域、不同層帶問題作不同的理解，有助於接近歷史的真實。⁵

一般而言，當我們說中國現代化的變遷受制於西方示範效應和歷史傳統輻射這雙重變數時，並不意味着贊同「傳統與現代」這樣一種二分法模式。將傳統等同於抗拒、現代理解為發展的觀點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在西方中國學界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著作為代表。這一分析模式與「衝擊—反應」模式一樣，同樣隱含着西方中心主義的意味，將豐富複雜的現代化變遷作了過於簡單

5.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40-42頁。

的、形式主義的圖解。事實上，「現代」與「傳統」在歷史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功能是異常複雜的。以現代化而言，這一現實神話固然給人類帶來了物質的繁榮、知識的爆炸和文明的進步，但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社會經濟二元化結構的緊張對峙、政治秩序的混亂、個人安全感的喪失、道德信仰的崩潰、終極價值的消失等。現代化「同時具有創新和破壞作用的過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機會，也可能使人類付出混亂和痛苦的極大代價」。⁶

同樣，中國的歷史傳統固然給現代化的發展帶來了眾多負面的抗拒效應，然而我們也應注意到，推動社會變遷的若干要素又是在中國的自身傳統中提煉、轉換而來的，比如在現代化啟動階段，傳統的「經世致用」精神就為推動社會變革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中國知識分子由來已久的入世傳統也為社會的世俗化提供了精神資源。儒家文化固然難以像新教倫理那樣，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精神，然而一旦置身於現代商品經濟中，又會誘發出一種在功能上與新教倫理相類似的儒家資本主義精神，江浙資產階級在工商業中成功的經營活動顯然與中國文化傳統中某些價值資源有關。再如中國傳統社會封建等級制色彩較淡，以理性化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階層流動傳統和普遍成就取向至少在形式上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合法性證明。總而言之，在西方示範效應與中國歷史遺產這一張力場中，各種要素此消彼長，生死存滅，重新分化組合，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格局，無論是西學還是傳統，每一要素是否符合「現代性」都有其特殊的語境或邊界條件，一旦超越臨界點，其實際功能就會向反面轉化。因此，當我們在為它們在現代化變遷中的角色功

6. 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24頁。